农业结构调整先要稳住粮食

瞿长福

纵论 Comments

每逢粮食生产形势好转时，总有人认为结构调整就是调减粮食，这种思维没有把结构调整与粮食安全的政治账、社会账、经济账统一起来。没有了粮食安全保障，其他保障都失去了基础。任何时候，无论怎样转、怎样调，都不能把粮食产能调低了、耕地调少了

日前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对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作出了明确部署，要求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深入推进农业结构调整。这一发展要求，既准确把握了经济发展新常态背景下我国农业发展的实际状态，也指出了农业发展如何适应新常态、加快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具体路径。

目前我国农业发展的实际状况，总体上就是压力与动力交互、机遇与挑战并存。一方面农业形势逐年向好，为全面深化改革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农业基础依然不牢，抗御各种风险的能力有限；一方面农产品总量质量不断提升，另一方面总量与结构、成本与效益、生产与环境的矛盾越来越大；一方面农业技术装备和科技支撑水平明显提高，另一方面传统生产方式、小规模经营和种业等关键技术滞后对农业的制约越来越突出。解决这些矛盾与困难，根本出路在于推动农业现代化，具体路径和现实手段就是切实抓好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可以说，以什么样的力度推进转方式调结构，决定了现代农业步伐的快与慢；以什么样的路径推进转方式调结构，决定了农业发展走什么样的路、结什么样的果。

如何转方式调结构？在粮食连续增产的背景下，调结构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粮食生产还要不要抓那么紧？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每逢粮食生产形势好转时，总有人认为结构调整就是调减粮食。上世纪80年代后期和上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经历过两次结构调整，当时粮食生产分别在80年代中期连续4年增产、90年代中期至1998年连续丰收，这两次连续增产之后我们都提出了结构调整，但由于调整思路和实践操作不到位，两次调整都引起了粮食生产下滑，最后结构调整不得不止步，陷入“空调”。

历史的教训值得深思。那种简单调减粮食生产的思维，没有把结构调整与粮食安全的政治账、社会账、经济账统一起来。一方面，粮食安全事关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是现代农业发展的第一要务，对我们这样的人口大国来说，没有了粮食安全保障，其他保障都失去了基础。任何时候，无论怎样转、怎样调，都不能把粮食产能调低了、耕地调少了。另一方面，即便从经济账来算，通过转变发展方式和结构调整，使粮食生产成本下降、产量上升，同时品质品种不断提升，生产加工更加适应市场需求，粮食本身也能成为“收入大户”。

当然，在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背景下确保粮食产能，在转方式调结构要求下稳住粮食生产，绝不是继续简单地以大量消耗水土资源、过度施用化肥农药对环境造成严重影响的粗放生产，而是要以提高粮食可持续发展能力为前提，稳产量、提产能，既要稳住粮食播种面积总体稳定，更要在提高耕地质量、强化科技支撑上下功夫，做到数量质量并重，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同时，按照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国家粮食战略要求，把农业生产由过去保全部、保所有转变到保重点、保口粮上来，为结构调整提供更加广阔的空间。

所以，粮食增产不是调减粮食生产的理由，而是为转方式调结构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而转方式调结构的扎实推进，又促进了现代农业的加快发展，使农业生产技术、品质、潜力进一步提升，使农业产业布局、区域布局、产品结构更加科学合理。

观察 On Watch

疏通京津冀金融协作渠道

李 晓

不久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重点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争取明年有个良好开局。

协同发展关键是市场的协同发展，能够形成让生产要素和资源要素合理流动的统一市场。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要通过改革创新打破地区封锁和利益藩篱，全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现在，中央层面已高度重视，但行政手段无法解决所有问题：三地产业结构相似、市场机制不完善、地方保护主义色彩浓厚等。所以，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必须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发挥好两只手的作用，最终实现市场协同发展。

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作用很大，既关系到实体经济的发展，又影响一体化的进程。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资金的高效流动是必然要求。河北省政府在日前印发的《关于加快金融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中提出，将做好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金融服务，促进设立京津冀开发银行，重点支持回报期较长的基础设施及其他重大项目。此消息随即引发各方热议。

现阶段，京津冀地区金融总体规模和发育程度均处于较高水平，经济金融发展互补性强，主要是北京存款充足、资金供给能力强，与津冀两地的贷款需求旺盛具有显著互补性。区域内的资金流动需求旺盛，但受制于行政壁垒和政策壁垒的限制，三地银行间跨区域合作的实质性支持很有限。从长远来看，消除行政壁垒和政策壁垒的限制，为金融资源在区域内自由流动创造条件，需要政府逐步完善政策和改进监管。至于银行间的业务合作应交给市场主体自己调节。例如，京津冀三地农信机构已达成一定共识，并签署了京津冀农村金融服务一体化战略合作协议，为协同发展提供金融支持，就有望取得很好的效果。

（《农村金融时报》供稿）

行业 Industry

以新常态心理看待股市楼市

郭文婧

虽然本周股市出现新的调整，今后走势尚不明朗，但此前的向好态势还是给不少人带来了影响，以至于出现有人“卖房炒股”的新闻。对此，证监会特别提醒投资者应理性投资，敬畏市场，牢记股市有风险，不要盲目跟风。

毫无疑问，股市、楼市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撑。基于市场资金一定的情况下，有观点认为股市和楼市之间存在“跷跷板效应”，即楼市繁荣了，股市就会衰退；反之，股市繁荣了，楼市就会衰退。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楼市与股市是“连带效应”，只有楼市好了，经济才会好，股市中房地产板块才会好，从而带来金融、建材等关联板块，让股市走好；股市走好之后的“赚钱效应”又反哺楼市，使楼市进一步向好。

回顾中国股市与楼市的历史会发现，这种“跷跷板效应”、“连带效应”并不明显。因为股市、楼市的门槛是不同的，资金的流动性、资金的性质也有区别。过去多年国内经济过度依赖房地产，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楼市政策调整时仍大多表现为房价上涨。股市则与其不一样，牛熊分界鲜明，牛则冲天，熊则入地。

不过，楼市、股市却都和M1（现金+企事业单位活期存款）密切相关。因为M1反映了企业和居民资金松紧变化，是经济周期波动的先行指标。如果M1增速大于M2（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速，M1领先于股市和楼市的这种正相关关系就更加明显。比如，2014年1月M1同比增长1.2%，创年内新低；6月同比增长8.9%创新高，但M2同比增长一直保持在12%以上，M1增速小于M2。这表明微观个体盈利能力下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尽管12月份的数据还没出笼，但近两个月来有关部门在加码批准基建投资，给人以充分的想象空间。而且，央行在适度注入流动性之后，还宣布了不对称降息。可见，无论股市还是楼市，近期表现出的向好趋势，都与政策面特别是资金面的利好分不开。

也要看到，由于楼市的刚性资金性质，股市的不确定性，决定“卖房炒股”、住房抵押贷款炒股，都是极少数现象。数据显示，目前股民进入股市的钱，主要是银证资金转入，而且一周还不到2000亿元。虽然A股市场新增开户数创下近3年半新高，但参与交易的账户数虽达到了阶段峰值，也才突破2000万户，可见，至少楼市的刚性消费者目前还没有盲目转移资金进股市，炒股的还是那些已经在炒股或准备炒股的人。另一方面，在本轮股市急速上涨行情中，大多数股民依然是“赚了指数赚不了钱”、“满仓踏空”，别说赚钱效应溢出影响楼市，可能连真正解套都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实际上，无论是我们观察股市，还是观察楼市，都离不开经济新常态这一背景，新常态最大的特征就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也表明，无论是股市，还是楼市，未来的走势都取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取决于市场究竟在资源配置中能够起到多大程度的决定性作用。因此，对未来的股市、楼市，我们也需要心理的新常态来理性对待。

朱慧卿作 （新华社发）

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在审议的立法法修正案草案，将最高立法机关专属立法权中的税收一项单列出来，强化税收基本制度只能由法律规定的“税收法定”原则。税收的基本职能是为公共服务筹集经费。公民有依法缴税的义务，税收也是对居民财产无偿、强制征收。专家指出，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这种关系，需要寻求平衡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法定程序，程序正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结果的正义。 （时 锋）

多棱镜

未成年人代言广告理应严管

事件回放 《爸爸去哪儿》等亲子综艺节目走红后，不少明星带着孩子以代言人的身份出现在各种广告中，这种现象以后将会改变。近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广告法修订草案二审稿规定，不得利用10周岁以下未成年人作为广告代言人。

涉足商业影响健康成长

时下，少数家长受利益驱使让孩子去当所谓的“童星”、“童模”，频频为广告代言，将娱乐界的浮躁心态及功利思维过早地灌输给孩子，这不利于孩子健康成长。要知道，让孩子过早地涉足成人领域，做一些“少儿不宜”的事情，可能会毁了孩子的一生。

未成年人频频代言，除了家长和商家之外，部分电视台等媒体也难辞其咎，有的甚至还扮演了“操盘手”角色。对于某些拿年幼孩子当作商业炒作工具的所谓亲子综艺节目，应该加以必要的限制。同时，应从严管理电视台等媒体拍摄、播映未成年人代言的广告。

（汪昌莲 湖北咸宁 公务员）

不妨对广告分级管理

禁止10周岁以下未成年人代言广告，这一方面体现出对某些“童星”的保护，防止代言广告的未成年人被当做某些机构或人群的敛财工具；另一方面，这也是对广大缺乏鉴别能力的未成年人的保护。当前社会上广告泛滥，暴力、色情类的广告让人避之不及。笔者认为，在广告方面保护未成年人，不妨借鉴国外电影分级的经验，对广告进行分级。这样一来，哪些广告适合未成年人代言，哪些广告适合某个阶段的未成年人观看便一目了然。例如，《广告法》应该禁止10周岁以下未成年人代言商业广告，但应允许代言适合其年龄的公益广告。对广告进行分级，规范广告商行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广告对未成年人身心造成的不良影响。

（张海英 北京 教师）

限制年龄更要管好内容

基于未成年人身心发育尚不成熟、认知能力仍有局限，明令禁止10周岁以下儿童做广告代言人，释放出保护未成年人权益、促使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制度善意。但是，仅仅限制代言者的年龄和身份并不能完全杜绝广告行业的乱象，夸大宣传和弄虚作假才是广告乱象的症结所在。限制代言年龄，也要管好广告内容。立法规范广告行业，重在对其内容真实性的审查与把关，尤其是要严格追究虚假广告代言者的连带责任。对于由未成年人代言的虚假广告，可对广告制作者处以包括“连带者”的双倍处罚。

（张玉胜 河南漯河 市民）

放宽外资银行准入有助银行业转型

莫开伟

为外资银行设立运营提供更加宽松、自主的制度环境，是我国银行业发展现代化、国际化以及中国经济更好融入国际大循环的现实需要。外资银行监管复杂性和艰难性，也对现有监管法制、监管机制、监管力量提出了新要求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近日签署第657号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15年1月1日起施行。

这次修改《条例》，是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形势下，对外资银行主动实施的进一步开放措施。近年来，我国对外资银行准入和经营人民币业务规定的条件较为严格，外资银行市场占比份额较小。在确保有效监管前提下，适当放宽外资银行准入和经营人民币业务条件，为外资银行设立运营提供更加宽松、自主的制度环境，是我国银行业发展现代化、国际化以及中国经济更好融入国际大循环的现实需要。

这次新修改的《条例》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首先，对外商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设立分行，不再规定其总行无偿拨给营运资金不少于1亿元的最低限额，可根据业务需要自行有效配置营运资金，大大提高了外资银行设立分支机构可行性。尤其是取消了设立代表处作为设立分行的条件，外资银行设立自由选择度更大，会触发新一轮外资银行在华设立的热潮。更多外资银行落户中国，将有效改善中国银行业结构，提高银行业整体服务效率，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高效、贴切的金融服务环境。

其次，放宽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条件，不对盈利进行要求。外资银行只要有1家分行获准经营人民币业务，其他机构可不受开业时间限制，提高了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的主动性和灵活性，为有效开展人民币存贷款业务提供了便捷条件，可拓宽外资银行与中资银行相互交流和合作平台。且外资与中资银行相互开展人民币业务，既可深化银行业对外开放，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外资银行积极作用，促进国内外银行业在资金、技术、产品和管理方面进一步融合，也可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提升我国银行业服务和管理水平。

再次，随着外资银行机构增多，将会把管理规范、高附加值的金融服务产品、业务发展比较成熟的模式带到中国，从而对中资银行形成较大影响，会促使中资银行加快经营转型，转变服务方式，推动经营效率提升；会迫使中资银行进一步把服务重点转向实体经济，从而扭转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不利局势。

客观地看，《条例》的颁布和实施将对我国银行业带来较大冲击，在居民储蓄存款分流日趋严峻形势之下，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使本已竞争激烈的存款市场更加“白热化”。同时，在与外资银行竞争中，一些中资银行在信贷管理、经营指导思想、服务方式或金融产品等方面有较大压力，经营服务软肋和缺陷也有所不足，有可能会使部分优质客户流失，从而进一步影响中资银行信贷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

要应对这些不利影响，中资银行须切实加快经营转型，提高中间业务服务能力，从而增加经营竞争和盈利能力。同时，银行破产制度也需尽快推出，全面实施存款利率市场化。此外，外资银行监管复杂性和艰难性，也对现有监管法制、监管机制、监管力量提出了新要求。要充分履行对外资银行有效监管，监管部门要在监管理念上有新突破，监管方式上有大转变，监管水平上有质的飞跃，监管队伍建设上有现代化跨越。

欢迎读者就热点经济话题发表评论、漫画，来稿请发至：mzjjgc@163.com。

本版编辑 杨开新 周明阳